

◀ (上接 14 版)

到：“我的通鉴老师是孙国栋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老师”(2016.9.23)，“孙老师从上课第一分钟讲到最后一分钟，绝少不相干的段子，宛若要把一生功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毫无保留地悉数传授给我们。老师如此卖命，我们学生大为感动，也跟着全力以赴，不要辜负老师，这就是身教”(2016.9.26)。柳先生在最近十多年内利用周六休息时间组织史料读书班，风雨无阻，甚至有从上午八点半一直持续至晚上九点的情况，想来是受了孙先生的巨大感召的必然结果。

又如在讨论如何利用《宋史·刑法志》时，我提出引入当下时髦的“历史书写”的可能性，这就涉及撰写者的问题，他回复道：“无论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宋史·刑法志》，重点不在撰者是谁，而在《刑法志》本身写得好不好。有如双匿名审查，不必管作者是谁，只管内容好不好。钱穆门人罗球庆老师的名著《宋代兵制研究》(应是他的硕士论文)，就是针对宋史兵志的缺憾加以重写，他何曾纠缠于撰者是谁！您不妨参考。研究宋代法律，必须熟悉宋代其他专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2016.10.10)；在我们讨论学者们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时，他提道：“我很好奇，窄化或樊笼化较易发生在研究机构，但大学要教书，如教宋史，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必须教宋代艺术、朱子学和早熟稻等重大议题，应容易扩大视野和兴趣，怎会那样僻？所谓僻，是宋代法律史教不了几节课，非得从法律扩大到社会、史料、宗教，甚至小说不可，我可以不扩张，但学校老师不能不扩张。罗球庆老师是书法家，自然留意宋代艺术，有一年的大考题目是‘宋代畫院’，有些同学看成‘書院’，真的反映眼光狭窄，以为宋代只有教育可谈”(2018.11.7)；在我评论了目前文、史、哲三科的平均研究水准后，他回复道：“以前不是这样，我向往文史一家亲的传统，大学副修中文系，对讲授诗经的东大博士杨钟基老师(师母是艺术系留学史丹福的高美庆老师)和教授书法的常宗豪老师都很佩服……其实宋史罗球庆老师也是书家，跟常老师都有作品发表在《书法》。哲学系教逻辑的何秀煌老师，草书让人心仪，但我最佩服的还是他对公平公义的追求，不愧殷门(殷海光——笔者注)子弟。那时的文史结

合较现在强多了，我辈未能继承和流传这个美好的传统，有愧呀”(2016.10.31)。

其实柳先生不仅辅修中文，而且跟哲学系、社会学系的师生也颇多往来：“到目前为止，思想史只佩服一位：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是我退休后保留的少数书籍之一，1974年版，是大学时的读物，现在已看不清当年写下的蝇头小字了，那时我跟哲学系、中文系和社会系的同学混得较熟，哲学系较左倾，系里随意放着康德、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任人购买，穿着也像毛装，而社会系右倾，以交女友为第一要事”(2018.4.13)。这大约也影响了柳先生此后对于社会科学的态度(见《族谱与社会科学研究》，《汉学研究》第6卷第2期，1988年；《第十八层地狱的声音：宗教与宋代法律史研究》，《中西法律传统》第11期，2016年)。

普林斯顿大学时期 (1981—1986)

“回想子健师不厌其烦地改写而非重写我的英文稿，真是泫然落泪。他也清楚知道，我应是他最后一个弟子，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弟子了。”

柳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对他最有挑战与启发、最为怀念的读书岁月是在普林斯顿读博的五年和在哈佛法学院进修的一年(2016.5.16、2016.6.9)。在普大，他的授业

恩师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刘子健先生。

关于刘先生的道德文章，柳先生曾专门撰写过一篇长文《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宋史座谈会1994年)。他经常说：“先把老师的治学与教学方法反省和整理，就跟我写《刘先生》一样，是成为学生或传人的首要功夫”(2016.5.7)，“在读书会，我不止一次请同学不要叫我老师，一是因为刘子健先生严于用‘老师’一词，甚至说那是严嵩的门人才干的事；二是何谓弟子？我清楚跟他们说过，熟悉老师的各种研究，遇到外人询问‘您的老师某篇论文有何观点’等问题，能够直述主旨甚至起而辩辩的，才堪称弟子。我还说，我实在幸运，因为罗球庆、邝兆江和刘子健先生的著作都不多，我都能够全部读过。子健师在我离开普大前，曾开玩笑说，大家都说您是我的闭关弟子，但愿您不要成为我的关门弟子。时至今日，我自问没有倒子健师的店”(2018.5.21)。

柳先生在前文中曾总结刘子健先生对于学生学位论文的四项要求：论旨明确、取材精审、组织严密、文字精简。对此，他曾提到：“经过先生删改的论文，字里行间往往倍加传神和紧凑，更令人感激的是那份时间和精力”(《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第16页)。近两年，他更是数次忆及于此：“在子健师去世前，我是多么地期待他修改我的论文，不断学习”(2016.10.25)，“回想子健师不厌其烦地改写而非重写我的英文稿，真是泫然落泪。他也清楚知道，我应是他最后一个弟子，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弟子了”(2017.11.9)。

其实，柳先生完全贯彻了



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成员合影：前排右起王德毅、李震、宋晔、程光裕、黄宽重；后排右起柳立言、宁慧如、万霭云、温玉玲、刘馨璐、马德程(转自张维玲撰文、施昱丞访问记录：《王德毅老师谈宋史座谈会》，《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第22期，2017年4月)

刘子健先生的这种精神，数年来在眼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坚持逐字逐句修改甚至重写读书班的稿件，即将出版的集体成果《五代在碑志》(预计三大册，八十余万字)凝结着他的巨大心血。

从柳先生回忆恩师的文字来看，刘子健先生对他的影响大约还有以下两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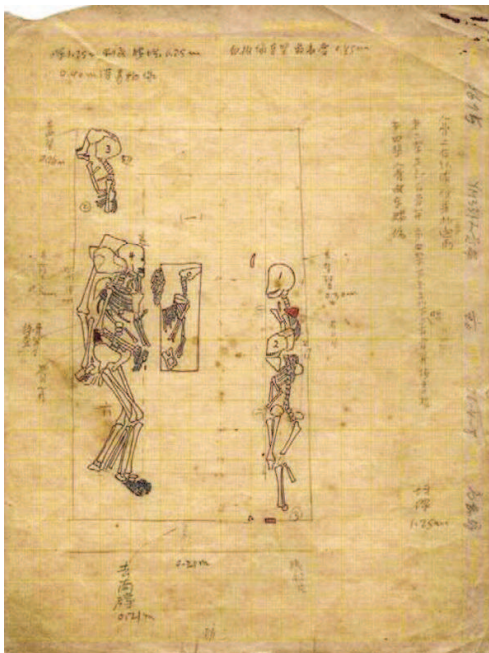
第一，如何选择优先阅读的史籍？如“好好读一本史籍，辅以邓老(邓广铭——笔者注)或严公(严耕望——笔者注)的钥匙，确是打好基础的良方。挑哪一本先读，就见仁见智了。受子健师的影响，我全读宋文鉴和宋代诸臣奏议，再选读历代名臣奏议。好处很多，首先是得其广博，因为两书几乎无所不包；其次是提高问题意识，而且了解什么才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致自我作古；再次是领略博士官员们如何写论文，如何起承转合，如何逻辑推理，以求自在圆满。我想他们写奏议时的苦心经营，一改再改，绝不亚于我们写学术论文”(2016.9.23)。

第二，最不能接受的学术缺点为何？如“对我而言，无可药救的是头脑混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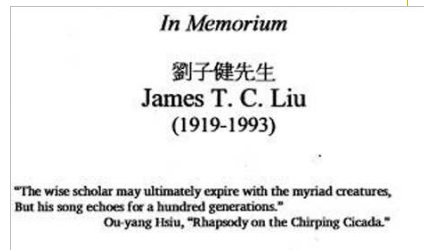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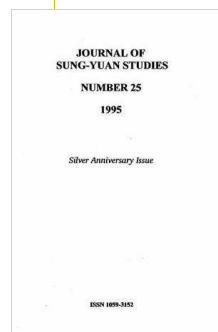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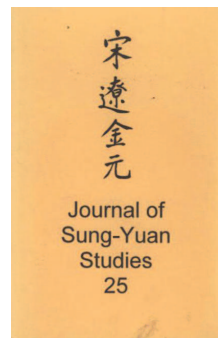
知逻辑为何物。这个标准，当然是受刘子健先生影响”(2016.6.16)。而他在前文中曾经引述过刘子健先生的原话：“在大考前，尤其在华洋学生杂处的情况下，先生注意的是启发、方法(Methodology)、工具书和研究动态；‘至于史料史实，几年后就忘了很多，如果需要，有书目在，可以去找。但脑筋如果不好，却不易扭转。’”(《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第14页)

其实，柳先生和刘先生都以“凶”著称，这种脾气、个性虽是天生，却也显出师门的特色。柳先生曾坦言，“老实说，我对刘子健先生跟史语所的关系并不了解，因为他很少说，而面对这位严师，我也不敢问”(《史语所与刘子健先生》，《新学术之路》，“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第1039页)。而在谈到自己时，他也说：“读书班的学生对我只有敬而无爱，就好像我对刘先生一样，您要这样子吗？子健师去世不久，有一位美国宋史后辈写悼文(竟找不到了)，提到刘先生感慨没有

(下转 16 版) ▶



1937年4月8日高去寻先生手绘YM331号墓出土的人骨架及相关位置等记录(转自《潜德幽光——高去寻院士百岁冥诞纪念集》“六、相关档案选辑”之五，“中研院”史语所2009年)



刘子健先生去世后，美国宋史学者 Peter J. Golas 于发表在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No.25 (1995) 上的悼文中提到，一些人无疑会被刘先生令人畏惧的个性所吓到。